

文化外交专题

微观视角的中拉媒体传播

——拉美社会的中国知识体系建构与传播效果的文本研究

万 戴

内容提要：中国和拉美国家之间的媒体报道和交流是中拉人文交流的组成部分，也是交流成果的具体表示之一。媒体传播成效不仅体现于双方报道的数量和覆盖群体，微观层面的报道方式、受众对于报道内容的理解与反馈情况也是衡量传播效果的重要标尺。本文选取智利主流平面媒体《信使报》作为具体案例，考察了该报在2016年习近平访问智利期间的相关报道组稿，结合其媒体经营历史和报道倾向，分析报道组稿中具体文本的构成、语言特色以及在网络平台的受众反馈情况。同时，也通过实地调研重构智利知识阶层有关中国的知识体系，考察智利媒体受众对涉华新闻的理解能力和解读方式。研究表明，对象国的历史和政治环境、媒体受众有关中国的常识体系、相关媒体平台的语言体系和政治倾向，均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传媒产品的实际传播效果产生影响。这种实际影响对于传播受众的微观影响具有持续性，导致传播的实际效果与生产预期产生一定偏差。中拉双方媒体需要从微观层面进行分众传播来消除或改变这种影响。

关键词：中国 拉丁美洲 媒体传播 文本知识体系
《信使报》

作者简介：万戴，哲学博士，供职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 (2018) 05-0125-13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和拉丁美洲的交往逐渐深入,在政治、经贸、科技、文化等宏观领域都有着长足的进展。双边经贸的高速发展、政治上的高层互访频繁、双边伙伴关系升级、地区一体化协议意向的达成以及科技和文化交流成为中拉关系飞速发展的明证。需要看到的是,中拉双方在宏观领域的交往成果要转化为微观领域的基本常识,也许需要更加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在各个微观层面,尤其是在舆论层面上会展现出丰富而繁杂的现象。虽然这些现象的成因复杂多样,难以在一篇论文中对其进行详尽阐述,但我们可以从文本入手,考察新闻产品和受众反馈里每种叙事和评论方式。与宏观性的分析不同,这种研究不具有普遍的统计学意义,但却可以在更具体的层面上对媒体产品和传播效果进行重构。

一 《信使报》对于 2016 年习近平访问智利报道文本例析

2016 年 11 月 17—23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就任国家主席后第三次访问拉丁美洲,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第 24 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同时访问厄瓜多尔、秘鲁和智利三国进行国事访问。在整个访问时序中,习近平于 11 月 22—23 日对智利进行正式国事访问。智利媒体无论立场如何,均对此次访问表示出了高度重视。智利最大的平面媒体《信使报》(*El Mercurio*)在习近平访问智利前夕就在纸质报纸上全文刊登了习近平的署名文章《共同开创中国和智利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并对此次访问进行了较为立体的组稿报道,在 48 小时内发布了 4 篇不同角度的长篇报道、1 篇专栏和 1 篇社论(见表 1,不包括消息稿)。

这六篇文章写作的侧重点非常明显,其中四篇涉及高层访问期间中智双方签订的各项合作协议、中智贸易、中国在智利的投资、中智自贸协定的升级谈判,几乎囊括两国间所有重要的经济议题。这种侧重点是由智利对华交往的战略重点决定的,同时体现出智利的国家特点和受众偏好。智利是南美洲乃至整个拉丁美洲最为开放的经济体,经济发展向好,因此经济是其主要议题。此外,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的军政府执政和政治高压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经济议题成为更稳妥的舆论话题。其余两篇则关注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个人经历,以及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盛行的情况下中国采取的积极应对措施。整体而言,无论是从时间排序上还是从内容排序上看,六篇报道都形成了一个较为立体的序列。

表 1 《信使报》习近平访智新闻报道序列

	标题
长篇报道	1. 《习近平在智利：此次访问力求巩固中国投资》 2. 《习近平：被称为“新毛泽东”的中国领导人到访智利》 3. 《习近平签署双边协议，并邀请巴切莱特访华》 4. 《习近平访智：与巴切莱特签署的十二项协议细节》
专栏	5. 《中国领导力在行动》
社论	6. 《中智两国元首决定深化双边自贸协定》

资料来源：1. Emol, “Xi Jinping en Chile: La Visita que Pretende Consolidar las Inversiones de China”. <http://www.emol.com/noticias/Economia/2016/11/22/832276>; 2. Emol, “Xi Jinping, el Presidente Chino Conocido como el ‘Nuevo Mao Zedong’ que Visita Chile”. <http://www.emol.com/noticias/Internacional/2016/11/21/832137>; 3. Felipe Vargas, “Xi Jinping Firma Acuerdo Bilaterales con Chile e Invita a Bachelet Realizar una Visita de Estado a China en 2017”. <http://www.emol.com/noticias/Nacional/2016/11/22/832408>; 4. Felipe Vargas, “Visita de Xi Jinping a Chile: El Detalle de los Doce Acuerdos que Firmó Junto a Bachelet”. <http://www.emol.com/noticias/Nacional/2016/11/22/832423>; 5. “El Liderazgo de China en Acción”, en *El Mercurio*. <http://www.elmercurio.com/blogs/2016/11/22/46780/El-liderazgo-de-China-en-accion.aspx>; 6. Cristian Cuevas, “Presidentes de China y Chile Conducen en Profundizar el Tratado de Libre Comercio”, en *El Mercurio*. <http://www.elmercurio.com/blogs/2016/11/23/46816>. [2016 - 11 -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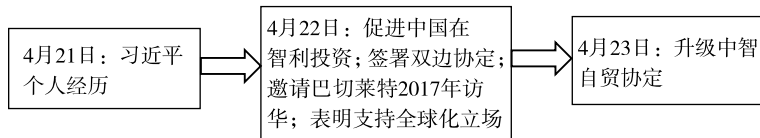


图 1 《信使报》关于习近平来访报道的时间与内容排序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在文本的叙事方式上，《信使报》也体现出了一些独特的风格。尤其是在作为访问预热稿的、讲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个人经历的《习近平：被称为“新毛泽东”的中国领导人到访智利》一文中，其独特性体现更为明显，可以作为例证进行分析。

首先是对于西方话语权的让渡和对中国式话语的尝试性使用。拉丁美洲媒体在国际新闻甚至国内重大政治经济事件的报道中，有一个被称为“北上南下”的传统，即在事情发生之初，观望欧美主流媒体的采访和报道。即使是发生在拉丁美洲内部的事件，也会由北美强势媒体（在 20 世纪以强势的新闻社为主，进入 21 世纪以来以旗舰媒体为主）先发布传媒产品，然后当地主流媒体再以类似的观点进行二次加工。这种新闻产品加工方式借用了欧美主流媒体的报道辐射能力和受众公信力，大大降低了本媒

体构建全球报道体系的成本。但放弃建设一线报道团队意味着让渡了媒体自身的话语权，导致拉美媒体成为新闻产品的二传手，并长期呈现“国内强势、国际弱势”的局面。

智利传媒学者雷耶斯·马塔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表达了对于这种现象的担忧：“许多在拉丁美洲发表的新闻，都是由欧美大新闻社生产加工而来，合众社和美联社的新闻产品分别占据拉美主流日报的39%与21%……事实上，强势的欧洲大新闻社只把最没有意义的新闻内容留给了第三世界的新闻社来报道。”^①

时至今日，该现象在宏观层面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但在微观层面和具体事项中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于中国在全球事务尤其是拉美事务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信使报》在新闻写作过程中除保留了一部分“崇西”报道传统外，也逐渐尝试使用中国式的表达来书写中国问题。如在介绍习近平青年时期插队经历时，《信使报》以第三方转述的视角进行了这样的处理：

在不利的情势下，年仅15岁的习近平需要和许多同龄的少年一样，从中国首都来到（农村地区）梁家河村。在这里他度过了七年时光。习近平作为一个“知识青年”，在BBC采访中，得到了当年乡亲的肯定：“坦率真诚”“人人都喜欢他”。这些经验成为他成长中的关键要素，在今天建立了他谦虚和勤奋的形象。^②

在这个文本中，叙述方为《信使报》，但发出此评论的则是更为强势的国际新闻媒体BBC。这种文本书写方式的动机不可臆断，但方式和结果都是确定的。虽然这是一种随机的模式选择，但从中可以观察到对于《信使报》而言，BBC做出的评论足以代替该报的态度（至少部分内容如是），而这种代替也默认一定会被读者所接受。事实上，在本篇目下72组评论中没有任何读者对于BBC话语的带入表示质疑。

在接下来的文本中，《信使报》的表达选择了更倾向于中国式话语，有一些是对于中国式话语的尝试性引述，而另一些则是对于中国现象的创造性表达。在表述习近平的治国理念思想时，《信使报》以“‘中国梦’和终结腐败”为小标题进行叙述。

^① F. Reyes Matta, “The Concept of News in Latin America: Dominant Values and Perspectives of Change”, in *News Values and Principles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Paris: Unesco, 1980.

^② Emol, “Xi Jinping en Chile: La Visita que Pretende Consolidar las Inversiones de China”. <http://www.emol.com/noticias/Economia/2016/11/22/832276>. [2016-11-22]

习近平主席有两个伟大的理想：一个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标志是在全球金融危机时期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另一个则是“强力反腐败”……习近平提出了“中国梦”。这个相对理想主义的提法让国际社会在数年间都无法准确理解和把握，直到2015年6月才逐渐清晰。在证券市场出现了危机的苗头时，中国政府立即开始注资，以保证股市的稳定和公信力。^①

在这里可以清楚地观察到，《信使报》在讲述中国当代政治经济议题时，自主选择了其认为是核心的事项，并且尝试直接引用中方的表达方式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及“中国梦”。而在这个表述上，《信使报》也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梳理：经济发展、消费、创新、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反腐败……通过对文本的阅读可以看出，《信使报》在报道中对“中国梦”等概念的理解是外向性的，愿意将其更多理解为一种国际战略。在宏观处理中，我们倾向于将这种文本表达认为是“媒体倾向”；而在微观视角里，在没有直接证据和旁证（比如同一报道序列中的其他新闻产品）的情况下，本文认为该倾向是《信使报》涉华报道团队对中国知识体系的系统性认知错误以及习惯性报道方式造成的结果，具体讨论将会在后面展开。

在习近平访问前夕，《信使报》就开始着力向受众传播中国当前的面貌（具体报道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可再商榷）。《习近平：被称为“新毛泽东”的中国领导人到访智利》这篇文章由于其题目中独特的说法“新毛泽东”，在习近平访问前后被中国多个媒体和研究机构摘选为典型的外媒舆论。在这篇文章中，“新毛泽东”的说法实际上来自于中国十八届六中全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②这一说法。《信使报》认为，这种说法让习近平在中国领导人中的重要性足以和毛泽东、邓小平的历史重要性相媲美。这个题目的确定并非单纯吸引读者眼球，在文本内部也有一定的逻辑。《信使报》选取这个角度，既是媒体的传播战略需要，也是在以比喻的方式向其读者介绍这位来访领导人的重要性。然而从读者评论来看，这种传播意图达到的效果非常复杂。相比照于其他文章的回复数量和内容，可以认为这种传播策略得到的直接反馈相对负面，但是有病毒性扩张的能力。

^① Emol, “Xi Jinping en Chile: La Visita que Pretende Consolidar las Inversiones de China”. <http://www.emol.com/noticias/Economia/2016/11/22/832276>. [2016-11-22]

^②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0/27/c_1119801528.htm. [2016-10-27]

二 《信使报》习近平访智报道序列的受众反馈例析

从反馈数量上来讲,《信使报》以上报道序列中的六篇报道所获评论数量并未超过其智利国内新闻的平均水平,表明该序列虽然是该阶段报道的重点议题,却并非网民的舆论热点。在这六篇报道中,读者评论数最高的恰恰是介绍习近平个人经历的《习近平:被称为“新毛泽东”的中国领导人到访智利》一文。同时,该文的评论倾向性也最为复杂,各种立场的、极端或中立性言论,受众间相互辩论乃至人身攻击均有所涉及,形成了规模有限但是较为完整的舆论场(见表2)。

表2 《信使报》习近平访智报道序列的受众反馈

	受众	评论内容
受众反馈中强势对话方对争论的回复	罗贝尔托·阿拉亚 (Roberto Alaya)	为什么会说中国是奴隶制?能否请您提出证据?按我的理解,中国(比起奴隶制)更偏向资本主义吧?
	卡洛斯·卡雷尼奥 (Carlos Carreño)	如果你要证据,你就自己去中国,从内部看看他们的奴隶制农场。我到过中国,我了解。……我对我的祖国有信仰,我觉得智利不需要依靠两个或三个合作伙伴,我们能做的要更好。*
受众反馈中的响应正文立论	莱昂诺尔·摩西 (Lenonel Moises)	我觉得中国自成一世界。美国欠了中国好多债,中国一旦要债美国就惨了。有趣的是美国人口有2.5亿,中国军队就有2亿人,贸易平衡也是中国占优。我最喜欢的是中国不搞价值观输出,不贩卖民主,不相信老美那套道德说教。*
受众以国内事务立场反驳他人的攻击性评论	贡萨洛·奥利瓦雷斯 (Gonzalo Olivares)	你描述的这些皮诺切特的暴行描述得很好,祝贺你总结了这暴君所有的破事儿。**

注: * 评论包含事实偏差,为研究需要保留原文翻译大意; ** 该评论是对于其他网友对于中国诸如“极端腐败”“犹如地狱”等攻击性言论的回复,为研究需要依照原文保留网友立场。

资料来源:参见 Emol, “Xi Jinping en Chile: La Visita que Pretende Consolidar las Inversiones de China”. <http://www.emol.com/noticias/Economia/2016/11/22/832276>. [2016-11-22]

就基本内容判断而言,其中较大一部分的评论与新闻文本本身无关,而是源于当地读者对于中国混乱的知识体系。其中最为明显的部分,是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共产党”等基本概念的混淆。在新闻正文部分只

出现了5次“共产”^①一词，而在评论中则出现了49次，而在所有评论中均未能对以上概念形成基本正确的认知，只是粗暴的情绪发泄。在此层面上进行评论的读者对于中国的理解基本停留在符号对应阶段，而在实际文本中这些评论占据了留言的开始部分。对于其他读者的质疑或者疑问，他们也多以情绪化方式回应，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占据这个迷你网络舆论场中的强势话语地位。

很明显，在该部分对话中强势对话方是完全封闭性的，没有表现出舆论场域的几个重要特征“平等性”“交互性”“参与性”，甚至也没有体现出“碰撞性”和“交锋性”^②，完全是强势话语者的单方面叙事，不仅完全不提供例证，同时也明显脱离了这篇新闻正文的标的，成为独立于文本的价值观攻击。随着持不同立场且相对而言有实际例证的强势异议者出现，在对话过程中逐渐与非理性对话者趋于平衡，前者不得不与后者形成交互，虽然对于实际问题的交流没有体现出实质性的帮助，但已经构成了一个真正可以让各方进入的网络舆论场域。

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舆论场域体现更多的是话语权的直接碰撞，而不是道理的争论。这种现象在这条新闻的评论中也得到充分显现。在讨论的各方立场中，也出现了对智利本国事务立场的投射。受众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支持和反对，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智利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阿连德执政与皮诺切特政变以及其后长达17年的军政府统治造成的思想阵营之间的对立。这种独特的历史背景使得智利受众在面对特定概念时会发生自身感情的投射。在这种投射的影响下，对于中国问题的攻伐也包含着智利受众本身所秉持的政治信念。

三 《信使报》报道传统与智利媒体集团新闻话语的垄断

从文本的书写方式和整体报道序列的安排来看，《信使报》的这组报道相对温和，尤其是有关中智经济的议题更是专注于双赢问题，受众本不应该出现过于偏激的反应。但是对于相关新闻评论的具体受众反馈的考察显示，各种评论立场鲜明，而且受众的观点和态度也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极端化倾向，单纯以本文角度考量是与正常逻辑相悖的。

^① 此处对“共产”的统计包括“共产主义”（comunismo）和“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者”（comunista）两词。

^② 聂德民：《对网络舆论场及其研究的分析》，载《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第189页。

但如果从智利的历史维度与新闻媒体现状来考察这组报道，新闻话语构成和读者反馈则会呈现出更多的理解维度，报道内容和受众反馈都具有了一定的合理性。首先需要考察的是《信使报》的报道传统与智利媒体话语构成情况。作为智利最大的平面媒体，《信使报》最初由智利财团爱德华兹家族负责人奥古斯都·爱德华兹·麦克雷（Agustín Edwards Mac - Clure）于1900年6月在圣地亚哥创办，其前身《瓦尔帕莱索信使报》（*El Mercurio de Valparaíso*）于1827年9月创刊，为西语世界最古老的日报之一，是智利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同时也是智利的传统右派媒体，在其媒体话语历史中有着非常明显的精英主义和反左倾向。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爱德华兹家族及其旗下媒体集团（包括《信使报》在内）作为重要的右翼话语平台，在智利新闻舆论场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1958年，奥古斯都·爱德华兹·伊斯曼（Agustín Edwards Eastman）接手《信使报》和爱德华兹家族旗下所有媒体。爱德华兹·伊斯曼是该报现当代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经营者，其漫长的职业生涯贯穿智利当代史，其鲜明的政治立场也给《信使报》带来了清晰的媒体定位。在他的经营下，《信使报》达到了该传媒集团的黄金发展期，在智利重要的历史变革时期对于国内公共话语体系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在1970年智利大选期间，《信使报》及爱德华兹家族旗下多家媒体持鲜明的保守主义立场，亲自参与构建保守主义叙事活动^①。该报以新闻报道和评论文章对左派选举联盟“人民团结阵线”和阿连德政府进行了全方位的批评与狙击，与当时尚存的左翼立场媒体形成了国家层面的平面媒体舆论场（见表3）。

表3 智利1970年大选期间国内平面媒体的政治立场对比

持左翼倾向的平面媒体	持右翼倾向的平面媒体
《国家报》（ <i>La Nación</i> ）	《信使报》（ <i>El Mercurio</i> ）
《世纪报》（ <i>El Siglo</i> ）	《最新新闻报》（ <i>Últimas Noticias</i> ）
《号角报》（ <i>Clarín</i> ）	《第二报》（ <i>La Segunda</i> ）
《最后一点钟》（ <i>Punto Final</i> ）	《论坛报》（ <i>La Tribuna</i> ）
《今日智利》（ <i>Chile Hoy</i> ）	《政治、经济与文化》（ <i>Revista P. E. C.</i> ）

资料来源：陈丽丹、刘慧：《走向法治化新闻自由的智利新闻传播业》，载《新闻界》，2016年第17期，第45-52页。

^① Víctor Herrero, *Agustín Edwards Eastman: Una Biografía Desclasificada del Dueño de El Mercurio*, Editorial Debate, Santiago, 2014, p. 380;

《信使报》这种鲜明的政治立场并没有随阿连德在大选中获胜而结束。美国尼克松时期政府的相关解密文件显示,《信使报》作为当时智利最重要的反共媒体,无论是在智利大选期间还是在阿连德上台执政以后,均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直接授意对智利左翼政府、左翼执政党以及阿连德本人进行攻讦。在阿连德胜选后,美国政府负责海外隐蔽行动的“40委员会”针对智利局势召开专门会议,将对《信使报》的资助纳入针对智利的有效舆论攻势范围。委员会负责人基辛格在会议中指出,尽管资助该报风险很高,但依然值得一试。为此,基辛格同意向《信使报》提供7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①,而《信使报》也配合美国中情局的计划针对阿连德政府乃至其本人进行了高密度的负面报道。

在客观上,《信使报》积极参与了1973年9月11日政变发生之前的舆论战,并且作为意识形态相近媒体,在皮诺切特上台后的高压政策下,享受到了长期垄断性发展的红利。皮诺切特军政府执政期间通过暴力镇压和颁布法令对智利左派媒体进行了彻底的取缔和封禁。当时整个圣地亚哥首都区只有四家报纸得以正常出版,其中包括《信使报》在内的三家媒体为爱德华兹家族所拥有。^②

自20世纪70年代后,《信使报》的精英主义政治话语逐渐形成和稳固,在智利社会乃至拉美媒体界形成了明晰的社会形象和媒体定位。在智利全国左派媒体遭到彻底破坏的十几年间,《信使报》作为商业媒体也赢来了自己的黄金发展期。左派媒体在20世纪90年代重新返场后并没有再次形成与该报相同体量的平衡舆论场。截至2016年,《信使报》仍然为智利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日发行量12万份,周日版发行量达到33万份,同时在地方省份拥有独立发行的子报子刊^③。在当前智利社会中,该报引导的舆论倾向和新闻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智利信息平台的主流话语,也培养出了与该话语体系共生的读者群体。

进入21世纪以来,尽管网络和新媒体平台逐渐成为信息平台,皮诺切特时代对于智利传媒业的影响并没有自然消弭。事实上,拉丁美洲媒体的发展轨迹与中国呈现出了非常大的差异性:传播手段的更迭并没有过多造成优势传统媒体的弱化乃至退场(如大规模本土网站平台、新媒体平台挤占传统媒体空间现象),而是由传统媒体不断进行自我业态更新,在适应新模式的同时也充分保持了媒体自身的报道传统。《信使报》的发展历程同样如此,其网站

^① 舒建中:《美国宣传战与智利“9·11政变”》,载《史学月刊》,2017年第8期,第83-90页。

^{②③} 陈丽丹、刘慧:《走向法治化新闻自由的智利新闻传播业》,载《新闻界》,2016年第17期,第45-52页。

“Emol.com”成为智利最重要的网络新闻平台之一^①。在拥有102%的网络接入率、82.9%的网络接入为移动互联网的智利^②，《信使报》成功的网络转型继续保持了其坚持的新闻话语和价值观在智利主流社会中的影响力。

传统媒体自我更新的成功，避免了新兴网络媒体和新媒体的过多入场，智利各大传媒集团继续保持其垄断性发展，主流平面媒体和其他媒体平台逐渐集中于几大传媒集团。仅仅《信使报》集团旗下就集中了《信使报》《瓦尔帕莱索信使报》《第二报》《最新新闻报》等多家重要媒体，形成了巨大的集群报道优势。在重大的国内议题中，只要几个集团之间达成协议，便能较为轻易地达成一致的舆论导向。而与之意见相悖的媒体平台，无论是用户覆盖率或是发行量都无法与之相比，造成的实际影响也就会小很多。

《信使报》形成其精英主义和反左倾向的报道传统，即使由阿连德执政算起，也已经接近半个世纪。该报在漫长的报道历史中，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左派”等词汇和表达已经形成了较为固定的负面价值判断，也培养出价值体系与报道风格相吻合的受众体系。而由于《信使报》同时扮演了“反左媒体”与“主流媒体”的双重角色，发展至网络平台难免有不同价值体系的受众进入，导致新的媒体现象出现。

四 智利媒体受众有关中国的常识体系构建

需要注意的是，前文所述的《信使报》传统右翼立场，在冷战之后更多集中于智利国内问题的报道立场。在理解其媒体话语时，并不能够将其国内和地区新闻的立场与其在国际新闻中的立场等同。受众对于具体涉华新闻的反应，也不能简单理解为媒体在报道中国时存在主观故意的负面报道。

在媒体的传统报道立场之外，智利一般媒体受众有关中国的常识体系构建形成了问题的另一方面。在宏观层面上，智利是南美洲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也是全球第一个与中国签署自贸协定的国家，同时也是孔子学院拉丁美洲中心所在国，可见智利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都与中国有着深入交往。然而以微观视角来看，通过新闻评论的文本分析可以窥见，有相当大比

^① Válida, “Boletín de Circulación y Lectura Diarios y Revistas 2° Semestre 2017”. <http://valida-chile.cl/valida/site/artic/20180327/asocfile/20180327154123>. [2018-03-27]

^② La Tercera, “Chile Alcanza Récord de Penetración de Internet con 102 Conexiones por Cada 100 Habitantes”. <https://www.latercera.com/tendencias/noticia>. [2018-03-27]

重的智利民众对于中国的体制和现状缺乏基本认知，在表达中难以对中国问题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讨论。

2016年笔者参加国家留学基金委“国际区域问题研究及外语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赴智利就“拉美社会中中国形象”相关议题进行访学。访学期间，笔者对智利大学位于圣地亚哥某学院的在读本科及以上学生进行了多次随机采访，其中涉及有关中国常识建构的问题（见表4）。由于智利贫富差距较大，本次调研对象集中在出生于1975—1990年期间的、来自智利中产及以下阶层家庭的学生。

表4 智利大学某学院学生有关中国的常识建构状况

问题	回答
在义务教育阶段是否能够得到有关中国的教育	公立学校中基本不设置相关教学内容
家庭成员对中国是否有了解	除有从事对华贸易人员外，了解较为有限
是否、从何时开始对中国有基本认知	对于有认知的答者，大部分来自于高校教育或工作接触
有何渠道能够了解中国信息	渠道相对有限，多为被动接受传媒产品

资料来源：作者编制。

虽然该项调查不具备统计学意义，但是可以合理推断，对于出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智利普通中产及以下阶层青年知识分子而言，通过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建立有关中国的常识体系较为困难。在有机会直接接触中国前，传媒也就成为其接收有关中国信息的主要渠道。于是现实中出现了媒体、认知主体、认知客体三种元素，主体实现对于客体的认知必然要通过媒介进行。而正如英伽—奥拓（Inga—Otto）思想实验所体现的一样，人们会发现主观认知和利用工具实现认知最后达到了一样的效果，但并不能反推两者的认知加工过程完全相同^①。《信使报》这样的媒体并不完全是客观事物，而是如上文论证的那样有自身价值观的语言体系，自然也就在多年的报道中培养了受众以及受众的阅读习惯。其文本叙事中产生的意象在媒体受众层面上引起的冲突，正是在这种熟稔的语境之中由于一些“隐喻式批评”被解读而产生的。在前文引述的《信使报》单篇报道中，引起读者评论的正是“新毛泽东”这一说法。同样的说法在邻国乃至智利其他媒体的网站中未必会引起舆论冲突，这正是由《信使报》的特殊语境决定的，“语境”和“关键词”正是读者认知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

^① [美] 弗雷德里克·亚当斯、肯尼斯·埃扎瓦著，黄侃译：《认知的边界》，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0页。

仅根据媒体的一篇或一组报道中体现出来的传播效果，并不能够测定媒体报道的动机。更为合理的推测是，《信使报》在本次报道文本中试图维持中立，然而长期形成的新闻报道语境和受众难以改变长期以来对某些意象的理解，同时也缺乏相关知识体系的建构，最终造成了现在的传播效果。

五 宏观理论和微观视角：从效果出发的拉美传播方式

由于《信使报》受众群体的具体个人倾向和对中国问题的认识水平差距，在中国国家元首访问智利期间的系列深度报道产生了某种程度的传播效果偏差，但是也不能因此完全否定该组传播的作用。正如前文所言，该组报道整体表述较为温和、客观，《信使报》及其网站（Emol.com）在智利国内平面媒体中的传播力也有着绝对优势。因此如果回溯该报道，仍然可以发现其由媒体传达到受众的过程得到了很好的完成。

在报道内容和报道倾向都偏向积极时，传播效果与传播预期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宏观传播策略和微观情况的碰撞所造成的。简言之，就是由于对传播对象和传播语言体系的不熟悉，仅仅以宏观层面习得的传播内容和手段进行大面积覆盖的传播，从而造成传播效果偏离预期。这种现象无论在中国媒体的拉美报道还是在拉美媒体的中国报道研究中都非常普遍。这是由于在惯常的中拉相关报道中，报道方仅仅需要按照事件内容制定单次的传播策略、生产传播产品，而学术研究中则侧重于对报道数量、发布平台、内容倾向、受众覆盖等方面进行定量宏观研究。此类研究关注具体事件、单个或单组媒体、固定传播平台或固定时间内传媒产品的发表数量、内容和受众分析，可以探究国家和地区传播影响力、受众的兴趣类别及媒体传播能力。由于其科学性、务实性，以及与网络传播、新媒体传播和大数据相接驳，宏观角度的研究在一段时期内成为中拉传播研究的主流方式。

依照上述宏观理论做出的报道规划，在现实层面上也出现了类似于上述《信使报》事例的效果偏差。这是由于对任何具体的媒体和受众群体，都存在依照时间线发展的常识系统、话语体系、报道和阅读习惯，任何单个事件的传播效果都需要综合考虑微观层面的所有因素，不能够对某一次传播行为进行孤立研究；同时对于整体而言作用积极的报道，也并不能保证在各个微观层面效果相同。

具体到中拉传播领域，拉丁美洲各个国家具有不同的历史、国情、政治

传统；不同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母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印第安方言）及不同教育水平群体对于同一传媒产品的理解能力和具体反映也会体现较大差异。以本文所使用的例子来说，在文本分析和背景分析中可以发现，由于长期形成的知识体系和阅读习惯，智利部分普通受众在对中国缺乏基本常识的情况下，对于某些意象形成了条件反射式的反应（其中一部分反应也是由媒体叙事逐渐培养出来的）；同时，由于智利本身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分层，对于国内政治倾向的立场和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会投射至国际新闻领域。因此，在受众对于中国整体情况认知水平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智利媒体在涉华报道中需要尽量避免使用指向性强的意象或比喻，才能够部分避免传播失焦。

为了弥补这种差异，需要在微观层面坚持针对不同受众制作和传播相关产品。具体到中拉传播领域，则应在了解传播对象的涉华知识结构（或中方对于拉美事务的知识结构）的同时，让自身的传媒产品有针对性地参与到受众群体的常识体系建立中。由于中拉媒体性质不同，需要制定不同策略。^①中国目前涉拉媒体（以汉语为主要报道语言）主要为覆盖全国的传统主流媒体，传播覆盖面广，受众群体多元。在目前的涉拉报道中，需要关注国情背景与新闻时事的结合报道，为中国受众提供了解拉美新闻内容所必要的知识基础，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武断解读和主观对比。拉美涉华媒体形态多样，有专门报道中国新闻的媒体、门户网站，也有如《信使报》一样的主流媒体和新闻机构。拉美不同媒体需要根据媒体自身报道方式以及受众群体的特点改进传播方式。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在涉华报道中的语言组织和意象指向，即使在较长时间内难以形成完全积极的报道氛围，也应有利于在读者反馈中形成较为健康、均衡的舆论场。

微观层面的报道和研究是一个细分且长期的工作，短时间内成效可能并不显著。然而通过多种语言体系、报道方式的对接让不同思想方式和行为模式进行沟通，最终达到不同国家受众间的互相理解，达到传播实效，也是新闻单位和传播研究者可以持续关注的现实维度。

（责任编辑 高涵）

^① 本文不讨论个别媒体在报道中出于政治和商业目的的偏差报道或故意误导受众的情况，仅讨论正常传播行为。